

周作人留下的小说创作轨迹及其意义

——以围绕着《社会小说 江村夜话》的问题为中心——

松冈 俊裕（日本）著 李 丹丹 译

关键词：小说 小品文 江村夜话 自卑感 不安心理 挫折意识

前 言

周作人于晚清光绪十年（一八八五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九六七年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在长达八十余岁的生涯中——晚年时而使用出典《庄子》的“寿则多辱”的印章¹——周作人完成了相当数量的著作及译著。而虽然如此，要想掌握其具体的精神面貌也确非易事。姑且不提所谓的对日亲善及后来将其视为汉奸等的负面问题²，仅就前半生来看，评论者描述的周作人的形象大致是这样：文章“平和冲淡”；人品“温厚和蔼”。都不过是些套话。也有借用周作人对五四前后的自我描述——“浮躁凌厉”的，不过如此。曾长年形影不离的兄长周树人，即鲁迅的看法则稍有不同。周作人的打油诗《五十自寿诗》以思想消极而受到左翼文学者酷评谩骂时，鲁迅这样评价道“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憚”（致曹聚仁书简）。本非庇护的说法，其见识非凡。尽管如此，周作人的暧昧模糊形象也并未一举鲜明起来，隔靴搔痒之感依旧挥之不去。

周作人的文章，以擅长于反语的文章也包括在内，大致都说明性强，整体感强，属于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类。与此相对他的文章又不能不让读者感到一种不亚于鲁迅的难懂，这是一种性质不同的难懂。这种难懂与其说是内容本身的难懂，不如说是多来自于反映出的、来源于作者性格的曲折的心理状态的难懂。笔者认为，要将周作人背负的这种“阴影”与其真实精神面貌联系起来，在目前只能先来弄清楚这个“阴影”的实际状态。

笔者认为：周作人的这样的“阴影”的渊源植根于幼年时代经历的特殊体——自卑感，后来小说创作失败进一步加深了周作人的这种“阴影”，这样的实际状态即使非全部亦当是其主体的精神面貌。以下笔者冒着陷入文学主义的谬误的危险具体阐述此推论。

一、周作人留下的小说创作轨迹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在小品文届周作人取得了超越了其他文学式样成就，将他称为小品文作家不会有异议。但是，发挥了周作人风格的不仅限于小品文，作为将东欧弱小民族、俄罗斯、古希腊及日本等各国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以及作为写作了打油诗为主体的旧诗及收集在唯一的诗集《过去的生命》（一九三〇年）中的新诗的诗人，也受到了很高评价。周作人作为小品文作家、翻译家、诗人的成就，虽说由于评论者的立场不同评价各异，但在质与量两方面均匹敌于鲁迅。仅有一点，无人称周作人为小说家上与鲁迅大相径庭。但也并不能立刻断言周作人没有小说创作。在其庞大的作品群中埋藏着未发现的小说的可能性相当大。

以笔者浅见，历来研究中论及周作人小说创造的仅有增田涉与赵聪，且两人在周作人有无小说创造的问题上均持否定意见。先来看看增田的说法：

……他似乎不曾写过小说，也没有典型的评论性作品，他所写的大多是所谓的小品文，其中多数是精于小趣味的随笔³。

再来看看赵聪的说法：

知堂老人以散文名，只憾不能写小说。（中略）他很想写一篇初恋的小说来纪念这一段情（对初恋少女杨三姑抱有的朦胧的爱慕之情——松冈注），可是终其一生，写来写去，都未能成篇⁴。

赵氏接下来又说“谁能指出，在他的著作中有小说呢？”。然而，周作人真的连一篇小说作品都没有吗？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其最少写作了八篇小说作品。（以题目、文体、署名之顺序列举如下。）

《孤儿记》 ⁵	文言	平云
《黄昏》 ⁶	文言	
《夏夜梦》 ⁷	白话	槐寿
《真的疯人日记》 ⁸	白话	槐寿
《星里来的人》 ⁹	白话	槐寿
《抱犊谷通信》 ¹⁰	白话	子荣
《一个求仙者的笔记钞》 ¹¹	白话	子荣
《村里的戏班子》 ¹²	白话	

这里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并非笔者自作主张的定义，而是依据了周作人自身的分类标准。他认为小说区别于散文（随笔）等其他文学样式的基准是看它是否有虚构性。¹³这是中国同时代的多数文学家的共同认识。

最初的《孤儿记》是作者有感于雨果的《悲惨世界》而写的两万余字的人道主义作品。

故事讲一个孤儿，从小贫苦，藏身土穴，乞讨为活；及长偶为窃盗，入狱做

苦工，因袒护同监的犯人，将看守长杀死，被处死刑。¹⁴但是这篇小说正如著者本人所说，是“半做半偷的（一半创作一半抄袭）”¹⁵ 作品，是否可以将其看作是原创小说还有疑问。正如凡例所说，作品的第十、十一两章使用了雨果的小品《克洛特格欧》的梗概。其后作者这样说明缘由。

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器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 Claude¹⁶ …为什么说“偷”的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我当初执笔，原想自己来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长大了之后，却没有办法再写下去，只好借用雨果——当时称为器俄，因为在梁任公的“新小说”上介绍以后，大大的有名，我们也购求来了一部八大册的英译选集，长篇巨著啃不动，便把他的一篇顶短的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¹⁷

因为情形如此，出现了阿英那样的将该小说视为翻译的评论者也就不足为奇了。¹⁸但是严密地说，有争议的部分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更接近于改编。从量的角度看其不过占《孤儿记》全十四章中的两章（《晚清文学业钞》中三十九页中的八页）而已。《孤儿记》作为纯粹的原创小说的确是明显的失败之作，但它并非改编更非翻译之作。对周作人作品进行增补修正的松井秀吉、松枝茂夫的《周作人著译书目》¹⁹ 中，将《孤儿记》划分为原创小说，周作人本人也认为这是一篇原创小说。因而，将《孤儿记》视作原创小说是妥当的，它是周作人事实上的小说处女作。

作品《黄昏》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九八《自己的工作》〈一〉）中首次提到的作品。鲁迅在此之前的一九一一年冬写作了文言短篇小说处女作《怀旧》。

我自己在同时时候也学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却还记得是《黄昏》，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以周作人在东京留学时代最初的寄住宿舍伏见馆相识的、绰号法豪的山西省出身的欧阳法孝为原型的。周氏兄弟离开伏见馆的原因便在于他。当时伏见馆的入浴顺序本以入住的先后顺序而定，但是欧阳法孝却无视这个规则，且常大声喧哗，周氏兄弟无法忍受他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搬出伏见馆。周作人始终没有把这篇小说投稿。

大约当时自己看了也不满意，所以也同样的修改抄好了，却是没有寄去。

《黄昏》这篇小说现已纷失，其详细内容无法知晓。但是从法豪是鲁迅以胸无大志而瞧不起的岩仓铁道学校的在籍留学生的一员这一点，以及周作人以着眼于讽刺令人失望的辛亥革命去向的小说《怀旧》为范本这一点来看，其创作动机并非单纯地为描写法豪猫头鹰一样的笑声而一吐为快，而是将沉湎于升官发财主义的低级清国留学生法豪树立为典型人物，以批判当时弥漫在清国留学生届的追求富贵利禄的风潮，借以讽刺辛亥革命的本质。

上文阐述了《孤儿记》、《黄昏》如何具备了小说构造（《黄昏》为推定），与此相比余下的六篇，特别是除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前后写作的、笔者未读的《星里来的人》之外的四篇，都是缺乏像样的情节的类似于小品风格的作品。《夏

夜梦》由序言及六篇小品（梦）组成；《真的疯人日记》由小序、跋及以“国民之邦”为舞台的相互关联的四个小品组成。《抱犊谷通信》是附有小引和后记的告白体小品；《一个求仙者的笔记钞》是正如题目所说的附有序的笔记体小品。最后《村里的戏班子》是以少年时代看村戏为题材的回想体风格的小品，在这篇作品中《夏夜梦》以来缺乏的故事性有所改善。《星里来的人》字数上不过报纸副刊刊登一次的程度。无论从缺乏情节这点来说，还是从后来被收集到小品文集中这点上来说，看清它们小说的本质是很难的。但是参照周作人要求的有无虚构性这点来看，除去《星里来的人》的五篇很显然是小说。其中《夏夜梦》和《真的疯人记》发表于《晨报副镌》的小说栏里，²⁰《星里来的人》也发表在这里。²¹

二、关于《江村夜话》的诸问题

在探索周作人小说创作轨迹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了启明作《社会小说 江村夜话》。笔者预感到，这篇作品若出自周作人之手，那么它将成为周作人小说创作，特别是掌握其挫折意识的关键作品。周作人本人对此作品只字未提这一点也充分引起笔者的兴趣。

这篇作品是以苦于水灾及水灾之后的不良影响的农村为背景，通过渔夫、塾师、农民讲述的夜话形式的作品。作品的中心在于，围绕着发生在一农家的悲剧而展开的争论。发生在农家的悲剧故事的大概情节是这样的。

大地主家的佃户老农年轻时向往荣华富贵。大地主家虽然地租征收苛刻，但是作为此家佃户却得到不少实惠。老农有个因美貌出名的女儿。女儿自持高傲，不想嫁为农家妇。那年四月，老农款待了来收地租的大少爷，将女儿引见给他。大少爷在老农家住了两晚，减免了老农家当年的地租。大少爷许诺娶女儿为妻，老农信以为真，七月进城拜访地主家，被看门人逐出。两日后，官吏来逮捕了老农及其儿子，毁坏了家具。老农及儿子被监禁期间，女儿病死，因不在家而免于被捕的老婆也突然死去。

争论的高潮在于探索悲剧的原因。得知了老农老婆之死的某农民说有传闻说此事主谋并非大地主家的大少爷，而是从前秋季庙会上与老农有过争执的村民为了泄愤而为。年老的老实农民甲站在同情失去如同“老牛舐犊”一样疼爱的女儿的老农的立场上。塾师将原因全部归结于大地主一方，主张对其严惩。与此相对，利益熏心的少壮农民乙欲步老农后尘，站在大地主的立场为其辩护，与塾师几乎要争吵起来。这时渔夫插入总结道，错误在于没有预料到日后灾难降临而放任女儿的老农。

《江村夜话》可以称作中国式《三醉人经纶问答》。与《经纶问答》中登场的三个人物身份均为作者中江兆民相对，《江村夜话》中的渔夫是作者的身份。通过渔夫的发言，阐述在当时远离改革的闭塞时代的状况下，保护女儿贞操的父母责

任之大的主题。这篇小说作为作品的完成度虽不能算很高，但是作者力图描绘出袁世凯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心理状态的主旨直接感染着读者，从这点上看，作者的意图基本上达成了。如果进一步将让人感受到近代现实主义气息这一点也纳入评价视野的话，《江村夜话》便是在只出有少数有阅读价值的作品的文学革命前夜时期的珍贵作品。

顺便说明一下，笔者开始关注该小说的契机是，有资料记载上文提到的杂志的第一卷第二期刊登了周作人的《艺文杂话》，笔者得知此消息，在翻阅此杂志时偶尔看到这篇文章。在同一杂志上看到的推断为周氏兄弟作品的有如下四篇²²。（按照标题、署名、卷号、发刊年月的顺序列举。）

《文艺杂话》	会籍周作人	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一四年二月
《江村夜话》	启明	第一卷第七期	一九一四年七月
《希腊拟曲二首》	启明	第一卷第十期	一九一四年十月
《玻璃神》	树人	第一卷第十一期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²³

（一）周作人笔名启明的使用状况

（1）启明的由来及使用状况

既是周作人的号又是笔名的启明的命名发端于留日时代。一九〇八年至翌年一九〇九年，周氏兄弟在位于小石川区新小川町的民报社听章炳麟讲授《说文》。章炳麟通过此前的讲习会的发起人龚味生，将德国人德意生（Deussen）著《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及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赠送给周作人，并建议他翻译前者。但是周作人因其内容艰涩，提出毋宁愿意翻译《邬波尼沙陀》本文（相当于《东方圣书》第一册的麦克斯穆勒博士的英译本），得到章炳麟的赞成。周作人对显示着《邬波尼沙陀》精髓的命题“梵我一如”深感兴趣，考虑先由自己口译查阅的几章，然后由章炳麟笔述。但是此计划未能成行。另一方面章炳麟着手学习梵语，但因找不到教师而不得不放弃。一九〇九年春夏之交，周氏兄弟收到章炳麟书信一封。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社。（中略）麟顿首。十四。²⁴

信开头称谓“豫哉”与鲁迅字“豫才”，“启明”与周作人的号“起孟”的音相近。这个在“智度寺”开始的讲习会的出席者除了章炳麟外只有周作人一人，然而周作人也对学习感到困难，只出席了两次，结果讲习会只得中断。然而从此以后，周作人以号“启明”代替了“起孟”，开始使用这个笔名。

直到后来章太炎先生于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写一封信来，招我们去学梵文，写作“豫哉启明兄”，我便从此改写启明，²⁵

使用启明的例子，据笔者所知，从周作人一九一一年夏留日归国到一七年离乡

去北京大学赴任的前后大约八年的绍兴时代，共使用过两次。

中华民国成立后，周作人就任浙江省教育局视学。后因患疟疾，由赴任地杭州返乡休假一个月左右。翌年的一九一三年四月，周作人被任命为绍兴县教育协会会长，同时兼任浙江省第五中学（绍兴）的英语教师。当时的聘书上为“启明先生”。²⁶

一九一六年，周作人为山阴县杜泽卿起草《蜕龕印存》，寄给北京的鲁迅。鲁迅删改之后署名周树回寄给周作人。但是该文在转年十七年的《叕社丛刊》第四期刊载的时候署名却是启明。

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后，在《新青年》、《语丝》等杂志上，周作人大致以“起明、开明、奚明、凯明、埤明、岂明、难明”的先后顺序使用了由“启明”变化而来的这些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又重新使用启明。

（2）希腊拟曲的译者启明

周作人一九〇六年处女作《孤儿记》脱稿之后，在因为结婚而临时回国的鲁迅的陪同下赴日。他先参加了中华留学生会馆主办的日语学习讲座，后于一九〇七年夏入学法政大学的特别预科。之后又于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四月十日，进入立教大学的豫科商科学习，周作人这样阐述在这里与此后一直关心的希腊文学的“相遇”。

一九〇八年起首学习古希腊语，读的还是那些克什诺芬（Xenophon）的行军记和柏拉图（Platon）的问答，我的目的却是想要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中略）一面读雅典哲人的雅言，有时又溜到三一书院²⁷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²⁸

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²⁹，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的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³⁰去听希腊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³¹

这里笔者对教授周作人希腊文的教师深感兴趣。这是因为看到了《希腊拟曲二首》序文中“余译此。深得余师美国泰克氏之助。敬致谢意”。这里的“泰克”与刚才引文中的“忒喀”发音相近，并且其也是美国人，由此判断，其就是立教大学 Tucker 校长（引文中的校长）的可能性极大。证明这个推论正确性的关键在于 Tucker 校长是否教授过希腊语。让我们看一看纪录当时状况的资料。

（文科）科目为英语、历史、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等。兼修科目有比较宗教学、社会学、德语、希腊语等。英语作为学院的特色科目自不必说，希腊语堪称文科第二特色。豫科本科均为每周三小时。教师是 Tucker 校长。现在的二年级学生已经在读色诺芬的《远征记》，明年计划读柏

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³²

根据同一资料记载，周作人所在的商科没有希腊语课，由此可推断他是上了文科的希腊语课。进一步认为周作人在三一神学校参加《新约圣书》讲座的教师也是Tucker 校长，这应该是不会错的。³³

《中华小说界》刊载的《希腊拟曲二首》的作者启明即是周作人，这在刚才Tucker 校长是否教授过周作人希腊语及(1)的论述中基本得到了证实。下面要论述的周作人的希腊文学研究轨迹中有《希腊拟曲二首》的事实，使刚才的推论进一步得到证实。

周作人以家中有事为名目，于明治十四年（一九一一年）四月十八日从立教大学退学，同年夏，与在东京娶的日本人妻子羽太信子结伴归国。

至于希腊哲人的文史著作，实在忘之生畏，自己估量不能及，不敢染指。这样的过了几年，一转眼间已是民国二十年即是一九三一年，距我初学希腊文的那年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年头了。这样搁置下去，觉得有点像是学了屠龙之技，不大很好，心想译点东西出来，聊以作个纪念；但是伟大的作品不敢仰攀，反过来弄亚历山大时代的著作，于是找到了希腊拟曲这个题目。这只是戔戔的小册子，计海罗达思的七篇，谛阿克利多思的五篇，一总才有四万的样子；但是写了有大半年，这才成功了。³⁴

西西里岛锡拉库扎人叟扑龙开始的“以性格描写和日常生活为内容”³⁵的拟曲几乎佚失。但是一八九一年英国肯庸博士发现了海罗达思作的拟曲包括一篇残篇共八篇。这用爱奥尼亚方言写作的拟古文体的八篇拟曲中，启明将《媒媪》、《塾师》两篇以书面语的形式汉译，周作人将完整的七篇以口语的形式汉译，这一事实不仅表现了二人对拟曲这种希腊古典文学中并不太惹人注意的文学形式的共同关心，而且作为启明就是周作人的这一推论的证据更具有积极意义。进一步讲，从《中华小说界》所载《艺文杂话》第七章中周作人介绍谛阿克利多思这一点，以及周作人和启明中心关注的问题都是拟曲的写实性这一点来看，《希腊拟曲二首》的译者就是周作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据上文提到的回想录的记叙，海罗达思的七篇与谛阿克利多思的五篇为初译，与笔者的推论相矛盾，但这只能是周作人的记忆错误。比如海罗达思的《媒媪》刊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的《晨报副镌》（署名仲密，题目译为《媒婆》，笔者未读）上。笔者推测，鲁迅日记中记载的“晚得二弟信，附《希腊拟曲》二篇”（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寄二弟信并《希腊拟曲》译藁一帖”（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的两篇就是探讨中的《希腊拟曲二首》。

如果《希腊拟曲二首》作者是周作人，一般可以推断《江村夜话》的作者也是周作人。但是这里要考虑周氏兄弟笔名互用的事实。像《怀旧》那样，周作人在鲁迅作品上属了自己的名字，或者鲁迅借用了周作人的名字，无论怎样，《江村夜话》的作者是鲁迅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文献查阅中没有

重要线索，那么应该从文体上加以讨论。但是目前来看，对此方面的探讨究竟没有效果，特别是对一般的规范性比较强的文言文作品来说，还存在疑问。所以，这里不进行修辞学的考察。

（二）《江村夜话》与《抱犊谷通信》的关系

将《江村夜话》视为周作人的作品，那么继承了此作品主题的，可以例举第一章提到的白话小说《抱犊谷通信》。

这篇小说取材于“当时一个叫孙美瑶的土匪头目在山东省临城附近，袭击津浦线，绑架中外人质，藏匿于抱犊谷”³⁶事件。作品由“编者”（即作者）的小引及假托人物吕鹤生³⁷所写的“通信”构成，文末附“编者”的后记。“编者”得到这些“通信”的经纬，在小引中是这样介绍的：

我常羡慕小说家，他们能够得到一本日记，在旧书摊上买到残抄本，或是从包花生米的纸上录出一篇东西来，变成自己的绝好的小说。我向来没有这种好运，直到近来才拾得一卷字纸——其实是一个朋友前年在临城附近捡来的，日前来京才送给我。这是些零零碎碎的纸张，只有写在一幅如意笺上的是连贯的文章，经我点窜了几处，发表出来，并替他加了一个题目。这是第一遭，不必自己费心而可以算是自己的作品，真是侥幸之至。

又依据小引，吕鹤生进入抱犊谷后下落不明，估计可能因其狂妄而被杀害。

《抱犊谷通信》是旨在文明批评的告白体作品，分为前半部和后半部。前半部中写：祖母因遭祖父虐待度过了痛苦的一生。“我”（吕鹤生）为了同样的苦难不再重演，教授长女（及其他两个女儿）人生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后，将其放出去。“我”认为女性在独立以后应该各自自主地生活，父母自不必说，即使是丈夫或者情人对其“性的过失”也不应干涉。基于此立场，“我”批判比父母、丈夫更加严格的监督着独立后妇女，散布谣言并裁断她们的“社会”动态。后半部站在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指出对她们进行严格监控的基础在于遗传的野蛮作风，进而得出结论“社会”必须努力避免这种蛮风。

“我”的主张中，除了后半部的文明批评的言辞激烈（也可以说因是小说，此种激烈程度是可能的）一点以外，没有其他显著特征，从与《江村夜话》的关系的角度来说，主要在于前半部。周作人在其他小品文中启蒙性地指出，妇女教育应该成为公众教育。《抱犊谷通信》中的“我”主张，觉醒人士只能先来教育自己的女儿，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与《江村夜话》的主题基本吻合。另外，“我”举出身边的度过悲惨人生的祖母例子，哀怜祖母之死，鲁迅在《孤独者》中同样哀怜祖母之死，两点结合起来考虑甚是意味深长。不过与《江村夜话》中借渔夫嘴说出的“女子豆田难管守”这样的含有讽刺意味的观点相比，《抱犊谷通信》中周作人的妇女解放论者的姿态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这是因为随着《江村夜话》执笔前夕出生的长女静子³⁸的成长，问题对周作人来说更加切实化，也是因为《抱

犊谷通信》执笔时，周作人对于妇女问题显示出比《江村夜话》执笔时更加积极的态度。《江村夜话》中将愚昧的老农比喻为“老牛（舔犊）”，《抱犊谷通信》中的“老牛”是“我”（即作者周作人），说明了这一点。更进一步说，《抱犊谷通信》这一标题正像作者所说本身就含有“老牛舔犊”的意思。

三、小说创作于周作人的意义

（一）幼少年时期的体验——不安的萌芽及向往安定的志向

众所周知，周作人作为人道主义的旗手对五四时期的文化界、思想界有着卓越的贡献。此后周作人欲亲手将这段历史抹去转而选择了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生活的时期为一九二四年。这个转换暗藏的周作人的本意是，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后欲构筑安定自我的精神革命。

周作人在学问、文化方面继承了浙江的自由主义及合理主义风格的传统。然而在气质、性格方面却鲜见浙东人特别是绍兴人的辛辣刻薄。生活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攻击的鲁迅，以帝国主义分子为由遗弃了日本妻子芳子（信子的妹妹），继而拒绝认领对此事进行抗议的子女的弟弟周建人³⁹之中，其幼少时期的特殊体验可想而知。周作人本人回忆的幼少时期的家庭生活是很痛苦的。在其性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的是缺乏爱。特别是对母亲鲁瑞，周作人虽然正面地认为当时她兼具“和蔼”与“强毅”两方面，但是并没有关于她对自己倾注了母爱的回忆。刚出生的时候应当是倍受宠爱的，但是不久母爱就被小他两岁的妹妹夺走，这导致了他产生了对兄妹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与被迫离开无乳母亲的怀抱，接受另一个同样无乳的乳母照顾的变态离乳结合起来，造成了周作人基本的精神不安。顺便提及一下，祖母蒋氏是周作人回想中唯一有着和蔼亲切记忆的人物，他在祖母身边得到了爱护，但是这终不能代替母爱。周作人对兄妹的自卑感的对象后来转移到年长四岁的鲁迅身上，加之后来回想中所说的“丑小鸭”等对容貌的不自信⁴⁰，更加强了他的自卑感。在此之上，到十五岁为止，妹妹端、曾祖母、小姑母、父亲仪炳、弟弟椿寿、初恋女孩杨三姑（名不祥）等人的先后离世，使他萌发了对“死”的恐惧感。另外，祖父福清在经济上及精神上给家庭生活带来的负担也使周作人承受了各种心理压力。这些诸因素综合形成了周作人幼少年时期不安心理。

形成周作人这种不安心理的诸因素中，自卑感是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不安”通常指对自己的死的恐惧感情。然而据关计夫所说“人不仅对于生物学上的失去生命感到不安，作为社会的一员，对失去精神上的生命也感到不安。（略）某些情况中，人对于丧失名誉心和自尊心等产生的痛苦更胜于生物学上丧失生命带来的痛苦。如此考虑的话，不安的要因来自于自卑感的情况最为多见。”⁴¹周作人在兄长鲁迅面前感到的自卑感中，参杂着对能力卓越的人生指导者、庇护者鲁迅

的敬畏之情及与弟弟们接触时保持的兄长威严的鲁迅的憎恶之情。在父亲死后，可以说鲁迅实际上代替了父职。直到与羽太信子结婚（一九〇九年），周作人与鲁迅一直维持着比较纯粹的兄弟之情。特别是留日时代的《新生》文学运动及《域外小说集》的共译出版都体现着美好的兄弟情。然而周作人在婚后随着独立的家庭生活的开始、后来生儿育女成为人父，精神上渐次安定下来，兄长也渐渐成为疏远而厌倦的存在。这种心理的隔膜当然在鲁迅心理也应当存在。这也成为后来兄弟失和（一九二三年）之际，周作人站在妻子一方的心理准备。兄弟不睦的原因，一般论者归结于鲁迅与信子之间的争执及兄弟思想的背离。然而笔者感觉周作人与信子结婚本身便是失和的开始。当然笔者并不打算评论信子的人格。兄弟不和是女权主义者周作人应当付出并且实际付出了的结婚的代价，鲁迅与信子都没有单方面的责任。

观其一生，周作人的一生“躁”期和“郁”期交替出现。与羽太信子结婚、与鲁迅失和、对日“亲善”等可以说成是失败之举的都发生在“躁”期。周作人初次试图对自身进行全面反省是在与鲁迅失和后的“郁”期。首先在接近不惑之年的一九二四年写下《一年的长进》，表达了脱离对作为衣裳的思想的依赖，初次领悟到自己的无知的认识。接下来，《教训之无用》中说道德、教训的无效性；《沉默》中认为在当今中国保持沉默是妥当的。《生活之艺术》中阐述了理想的生活样式；翌年二五年作品《元旦试笔》卸下“文学家”之名，自称为“素人”。这些一系列的关于处世的言论正是刚才提到的精神革命的目标。于是与鲁迅诀别的周作人回想父亲“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⁴²，欲与其同化寻求精神上的安定。《周作人自述中》中引用弗洛伊德得到这样的认识“如不懂弗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学，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全无处，全是徒劳”⁴³。这里可以看出知道自己的真实面目，并不断回归自我的周作人的姿态。这样的人或者事可能就称作突然改变态度。

（二）小说创作的挫折与与此相伴的小品文的选择

周作人小说创作的挫折意识萌发于处女作《孤儿记》失败以后，这点在其本人凡例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知道。

著者久欲作是书，而终不敢下笔；逮至不可复忍而作，而视之仍毫无趣味。

其故有二：一、思路窄；二、文笔劣。实则国学缺乏之故，敬敢谢罪。著者本意，欲于汉文上少加修饰，而为力所限，故多弱点。且存之，俟后日之改正。

然而周作人对自己小说创作能力的怀疑，不久便被对开始的《新生》文学运动倾注的热情所压倒而深藏于心。这种挫折意识再次抬头是在《黄昏》执笔时，因对作品本身不满意而始终未曾投稿。《江村夜话》的完成及其在《中华小说界》的刊

载虽然给周作人带来了几分安慰，这种挫折意识在其小说中完成度相对高的《江村夜话》与其翻译的西欧、日本小说，比如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乡土文学《炭画》的艺术完成度及身边的兄长鲁迅当时的习作《怀旧》的完成度相比，进一步得到强化；尤其是与自幼少时期始一直对其怀有自卑感的鲁迅的小说创作的关系不能不加以重视。此时，对第三者鲁迅小说所下的客观的评价就相对地左右着对周作人小说的评价，进一步加强了其挫折意识。

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总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寇冲。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⁴⁴

鲁迅兄作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⁴⁵

豫才兄作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⁴⁶

周作人本人始终未曾言及《江村夜话》的执笔或者其存在的事实，使人更加关注此作品强化了其挫折意识的重要作用。如此，周作人认识到小说创作所必须的东西并非是对国文学的造诣，而是文章构成力和想象力。

小说创作的挫折意识的深刻化带给周作人的影响，可以考虑为其对小品文的选择。木山英雄在其一篇文章《美文》⁴⁷中提到周作人的小品文选择的问题，他精辟的指出“我们应该关注：周作人对小品文的选择，是在输入和模仿的时代中最先执着于自身及自身能够代表的本国民众的素质和趣味的基础上进行的，表明了作为新文学的诸样式中的一种形式，艺术化散文的可能性”⁴⁸。笔者认为在木山所说的前提中加入了推断出的其小说创作的挫折意识加深的事实，可以更加正确理解木山的见解。就是说，在众多文学样式中，周作人并非任意地，而是有意地选择了取代要求有构成力和想象力的小说的表现形式——小品文的。如果没有这种理解则不能充分说明其提倡小品文的唐突性。这个当时读者仅作为缺乏小说与诗实绩的新文学界的“救生艇”而接受的提案中，巧妙地掩饰了周作人不为人知的个人情况。

本来这种选择并非是对小说创作的彻底断念或者是对小品文的最终选择，周作人的心境相当复杂。无论如何，周作人小说创作的最后尝试与小品文创作的尝试是并行的。（文学研究会同人王统照如果对周作人被埋没的作品表示称赞，或许会成为一种刺激。）后来小品文如胡适所说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九二二年）一样渐次成功，与此相比，小说创作则不尽人意，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周作人再次认识到自己没有创作小说的资质。这种表白最初见于上文提及的《元旦试笔⁴⁹》。上文中《抱犊谷通信》的执笔有着中途放弃的形迹。从小引中可见的作者自身对小说创作的自虐式的嘲笑中判断，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放弃。周作人无疑是想借《抱犊谷通信》及其后的《一个求仙者的笔记钞》间接地表明自己没有小说创作的能力，故此放弃小说创作。《元旦试笔》⁴⁹中“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叙述开始的“文人”否定的发言，被上海的左翼文学者误解为装作老成，然而其真实意图是要表明放弃从事包括创

作小说、长篇评论、诗以及翻译等文学活动，一系列的“自己觉悟对于文学的无知”⁵⁰等的表白源自于不加伪装的内心。

结 语

以知堂⁵¹为堂号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后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叙述了圣人的教诲“自知”之难以后有这样的阐述。

可是人苦不自知，那里我联想起那世界有名的安徒生（H. C. Andersen）来。他既以创作童话成名，可是他还怀恋他的蹩脚小说，《两个男爵夫人》，晚年还对英国的文人戈斯（E. Gosse）陈诉说，他们是不是有一天会丢掉了那劳什子（指童话），回到两个男爵夫人来呢？我的那些文章说不定正式我的《两个男爵夫人》，虽然我并无别的童话。

上文所说的“那些文章”指《光荣之手》（一九二八年）《关于活埋》（一九三五年）《赋得猫》（一九三七年）等的旨在民族自我批判性的小品文。周作人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说这些作品未必不是安徒生的《两个男爵夫人》，这虽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是从他的口吻中也可以看出对作品的自负。无论如何，在期望着以去除中华民族的痼疾并加以批判为内容的自己的小品文——这孕育了与鲁迅的“杂文”接近的东西——“复权”的周作人的脑海里，应该浮现出曾经试图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同一主题而未能成功的过去的几幕场景。进一步说，我们难道不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吗：周作人在引用安徒生逸事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同样对青年时代的创作怀有着些许留恋，如此想着不觉苦笑起来。

注

1 周作人晚年自叙传《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七〇年）中也引用了“寿则多辱”（一《缘起》二〇八《后序》）。

2 关于周作人的对日“亲善”问题，参照益井康一编《裁判汪政权》（值村书店，一九四八年）及其著《汉奸裁判史》（みすず书房，一九七七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思想》第六一九号（一九七六年一月）至第六三二号（一九七七年二月）的长达十一回的木山英雄的连载文章《周作人沦陷颠末》。

3 见增田涉《周作人论》，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月报》第九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4 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香港中国笔会，一九七五年）“周作人”项。

5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春执笔。同年小说林社刊。后又收录于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四卷》（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

6 参照下文二一四页。

7 一九二一年九月执笔。连载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晨报副镌》，后收录于周作人《谈虎集》（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

8 跋文执笔日期为“一九二二年五月吉日”。连载于同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晨报副镌》，后收录于《谈虎集》。

9 执笔日不祥。原载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晨报副镌》。是否被其他作品收录不祥。笔者未读。

10 小引执笔的日期为“甲子除夕”（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通信》的日期是“癸亥孟夏”（一九二三年）。原载《语丝》第十二期（语丝社，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后收录于《谈虎集》。

11 序文执笔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原载《语丝》第十七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

12 一九三〇年六月执笔。原载不祥。收录于周著《看云集》（开明书店，一九三二年）。

13 周作人这种看法最直接的表述，请参见作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的《知堂回想录》的《后序》。

14 前面引用《知堂回想录》六一《鱼雷堂》。

15 同上。

16 《学校生活的一叶》（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收于周著《雨天的书》（北新书局，一九三三年）。

17 前面引用《知堂回想录》六一《鱼雷堂》。

18 参照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翻译之部》。

19 最初发表于《中国文学月报》第二十九号（一九三七年八月），后收录于松枝茂夫译《周作人随笔集》（改造社，一九三八年）之际，周作人作了增补修改。

20 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附录《〈晨报副镌〉分类目录》（二）。

21 同上。

22 笔者拙见，当时周氏兄弟与中华书局的接触有以下三次。一九一三年四月，就任绍兴县教育局会长的周作人在选择小学教科书时未采用商务印书馆版本而初次采用了中华书局的版本。又于同年周作人投稿中华书局《炭画》、关于童话启蒙的论文《童话略论》等，未被采用，原稿被退回。另一方面，鲁迅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将留日时代兄弟俩共译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劲草》投稿该书局，同样被退稿。又，中华书局创设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上海（据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中所收企虞作《中华书局大事记要》）。

23 笔者认为鲁迅的作品，发表拙译作于《文艺展望》第十五号（筑摩书房，一九七六年十月）。望参照。

24 引于周著《秉烛谈》（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所收《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等。

25 前面引用《知堂回忆录》五三《我的笔名》。

26 引于同上书九七《在教育界里》。

27 周作人记忆错误，正确的当为东京三一神学校。

28 周译《希腊拟曲》（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序。

29 Tucker, Henry St. George. “一八七四年——一九五九。拥有神学博士（STD）文学博士（LLD）等四个博士称号。弗吉尼亚大学出身。一九〇一年来日，在弘前传教。年仅二十九岁就任立教大学校长，在任期间，完成大学升格，购入池袋校区土地等，建立了现在学校的基础。一九一二年三月升任京都主教，二三年返美。”（立教学院百年史编撰委员会编《立教大学百年史》——立教大学、一九七四年——）。※ 正确的应该为法学博士。

30 参照注（27）。

31 前面引用《知堂回忆录》八二《学希腊文》。

32 《立教学院学报》第四号（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校报”《学院的现状》一，大学部。另外从《学院的现状》六、教员宿舍（大学部）的文章得知，当时教授希腊文的只有 Tucker 校长。另外在 Tucker 校长的自叙里也有如下内容。

‘In the college I taught Greek nine hours a week, lectured 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hristianity.’ (*Exploring the Silent Shore of Memory*, Richmond, 1951: Chap.VIII: “Purchase of New Site for St. Paul’s College 1909—1910”)

33 据松平惟太郎《圣公会神学院史》（《神学之声》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五六年六月）及 Tucker 校长自传第八章。

-
- 34 前面引用《知堂回忆录》八二《学希腊文》。
- 35 据《世界文学词典》（研究社，一九五四年）高津春繁执笔米某斯（即拟曲——笔者）一项。
- 36 据前面引用松枝译《周作人随笔集》注释“抱犊谷”一项。
- 37 吕与周作人母亲姓鲁音相近。又，周作人曾有一个绰号“鹤”。（据周著《谈虎集》所收《文士与艺人》——一九二五年四月执笔）。
- 38 静子七月六日出生，杂志七月一日刊行。虽然顺序相反，但是推断杂志实际出版日期应在更后。
- 39 据成仲恩《周作人与徐广平之间的恩怨》（香港《明报》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引用的日期为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写给成氏的周作人书简。
- 40 参照《夏夜梦》第六梦《初恋》。
- 41 关计夫《自卑感与不安》（性格心理学讲座第二卷《性格的形成》——金子书房，一九五〇年——所收）。
- 42 周著《夜读抄》（北新书局，一九三四年）小引（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执笔）。
- 43 《周作人自述》最初为一九三〇年为《燕大月刊》所写。引用部分为一九三四年补足部分的中心内容。据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一九三四年）收《周作人自述》。
- 44 《怀旧》（《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一三年四月）文末所附《小说月报》编者恽铁樵的批语。
- 45 陈独秀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写给周作人的书简。收于《实庵的尺牍》（周著《过去的工作》——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 46 陈独秀一九二〇年“中秋后二日”（相当于九月二十八日）给周作人的书简。收于前注《实庵的尺牍》。
- 47 一九二一年五月执笔。原载于同年六月八日《晨报副镌》（署名子严）。后收录于前面引用《谈虎集》。
- 48 收于木山英雄《周作人——思想与文章——》（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编《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学》——大安，一九六七年——）。
- 49 原载（署名开明）于《语丝》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后收录于前面引用的《雨天的书》。
- 50 前面引用《知堂回忆录》一三二《文学与宗教》。
- 51 据《知堂说》（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执笔，周著《知堂文集》——天马书店，一九三三年——所收），周作人因喜欢《论语》中的“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及《荀子》中的“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取名“知堂”。

跋 文

本文的正文及注释部分是发表于日本中国学会编《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九集（一九七七年）的拙论《周作人小说创作轨迹及意义——以〈社会小说 江村夜话〉的问题为中心》，在字句上加以最低限度的补改后的中译版本。本跋文及以下的补遗为新增部分。

补 遗

笔者在写作了本文之后，又发现了八篇被认为是出自周作人之手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以题目、文体、署名、发表年为序列举如下：

清虚先生小传	文言	之江柑酒听鹂声	一九〇一年
好枝花	文言	萍云	一九〇五年
女猎人	文言	萍云女士	一九〇五年
侦察	白话	顽石	一九一〇年
代师滥校牛教员致前监督肚君书	文言	鹤声	一九一二年
活孙国	白话	仲密	一九一四年
什锦独白	白话	大闲	一九二六年
仲篪先生	白话	陶然	一九二九年

《清虚先生小传》一九〇一年执笔，为未完稿。收录于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夜读的境界》（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好枝花》发表在《女子世界》创刊第二年第一期（总第十三期。《女子世界》创刊于一九〇五年）的“文艺栏”里。拙论《关于周作人短篇小说〈活孙国〉笔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文学研究》第三期[一九九一年八月]）收录介绍了本作品后，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一九九五年）、上文提及的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夜读的境界》中收录。笔者翻译了本文（译题为《美しき花》），并加译注、解说文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第五期（周作人特集）（二〇〇一年三月）的“翻译：周作人小说（一）”栏中。

接下来的《女猎人》也发表于《女子世界》创刊第二年第一期“文艺栏”中。上文提及的拙论《关于周作人短篇小说〈活孙国〉笔记》收录介绍了原文后，其《约言》部分收录于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中。

《侦察》发表于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绍兴公报》。后收于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夜读的境界》中。

《代师滥校牛教员致前监督肚君书》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越铎日报》的“丛录”栏中，后收录于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夜读的境界》中。

《活孙国》发表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笑报》“胡言乱语”栏中。该小说先收录于《关于周作人短篇小说〈活孙国〉笔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近

代文学研究》)中、后又收于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中国气味》(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

《什锦独白》执笔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二月)发表。后收录于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夜读的境界》。

最后陶然作《仲簏先生》载于北新书局半月刊杂志《北新》第三卷第二十·二十一期(新近作家特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发行)。这篇作品笔者也翻译成日文(译题为《仲簏先生》),并加以译注、付原文发表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文学研究》第二期(一九八八年十月)中(题为《翻译:陶然作〈仲簏先生〉[付原文]》)。在同一期杂志中笔者还发表了论述《仲簏先生》作者陶然是周作人笔名的文章《关于陶然作〈仲簏先生〉的考察——以作者问题为中心》。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信州大学 全学教育机构 教授)

(信州大学 全学教育机构 非常勤讲师)

2012年2月2日受理 2012年2月10日采录决定